

丑陋的中国人

作者：柏扬

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。

多少年以来，我一直想写一本书，叫[丑陋的中国人]。我记得美国有一本「丑陋的美国人」，写出来之後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。日本人也写了一本[丑陋的日本人]，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，他阁下却被撤职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。中国比起日本，好像又差一级，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，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，所以我始终没有写。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，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，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。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，在台北，听我讲演的人，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。就立刻不请我了。所以，今天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用[丑陋的中国人]讲演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。

有一次，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，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，我问同学会会长：「会不会有问题？」他说：「怎麽会有问题？」我对他说：「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：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。又讲一个问题题目，那可是双料。」跟训导处谈过之後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：「问题是没的，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？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。」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。他问：「同意不同意？」我说：「当然不同意，不过你一定要改，只好就改。」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「丑陋的中国人」。我对他说：「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，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。」他慷慨承诺。结果讲过之後，把录音带寄来，只有开头的几句话，以後就没有了声音。

今年我六十五岁。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。我对他们说：「我活了六十五岁，全是艰难的岁月。」我的意思是：不仅仅我个人艰难，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。

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，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，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，同你们谈「艰难」，你们既不爱听，也不相信，更不了解。我所谈的艰难，不是个人问题，也不是政治问题，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，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。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，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。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。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，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，永远无尽无期。

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，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、柬埔寨、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，我们所讲的「中国人」不是国籍的意思，而是指血统或文化。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，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，到了那裏几天之後，不能忍受，哭着回来。她说：「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。」後来我到了泰国。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。好比说：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。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，假使你的衣服破了，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，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，这就是商业行为，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，走到裁判所，问她：「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？」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，只有一个感慨「中国人造了什么孽？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？前年，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，看

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，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，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，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，我们觉得很亲切，问她「你怎麼会讲中国话？」她说：「我是中国人，从越南逃出来的。」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，一面说，一面呜咽。我只好安慰她：「至少现在还好，没有挨饿。」在告辞转身时，听到她叹了一口气「唉！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！」我对这一声叹息，一生不忘。

十九世纪的南洋岛，就是现在的东南亚，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。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：「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。」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，无知无识，自生自灭，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。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。灾难更大。最使我们痛苦的是：一百年来，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。几乎全部归於幻灭。来了一个盼望，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，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，反而更坏。再来一个盼望，而又是一个幻灭，又是一个失望。又是一个更坏。一而再再而三。民族固然长远的，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。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，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，经得起破灭？展望前途，到底是光明的，还是不平明的？真是一首难尽。四年前，我在纽约讲演，讲到感慨的地方，一个人站起来说：「你从台湾来。应该告诉我们希望，应该鼓舞我们民心。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。」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。问题是，鼓励起来之後怎麼办，我从小就受到鼓励。五、六岁的时候，大人就对我说：「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」我想我的责任太大，负担不起。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：「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」。现在，儿子又告诉孙子：「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！」一代复一代，一代何其多？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？

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，「反右」之後接着又来一个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天翻地覆，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麼大的一场人造浩劫。不仅是生命的损失，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。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，就跟禽兽毫无区别。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。这样一个民族：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，怎麼能够站得起来？在马来西亚，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，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，裏面有马来文，有英文，就是没有华文。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，没有华文就不好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现象一方面说，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，另一方面，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，没有地位，没有受到尊重。泰国的华人说：「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。」不要自己安慰自己，一个法令下来。你什麼都没有了。

现在，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，任何一个国家。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。都是一种羞耻。

等到收复它的时候，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，同到母亲的怀抱。双方都非常欢喜。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、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，当它们丧失的时候，是多麼痛苦，它们回归的时候，又是多麼快乐。可是我们的香港，一听说要回归祖国，立刻吓得魂飞魄散。这是怎麼一回事？至於我们在台湾，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，主张台湾独立。想当年。三十年前，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，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。三十年之後。为什麼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？赛普路斯，一边是土耳其人，一边是希腊人。根本是两码子事；言语不一样，种族不一样，宗教不一样，什麼都不一样，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。而我们，同一个血统，同一个长相，同一个祖先，同一种文化，同一种文字，同一种

语言，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，怎麼会有这种现象？

这种种事情，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，不但艰难，而且羞辱、痛苦。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，你不晓得他是怎麼一回事，左、右、中、独、中偏左、左偏中、中偏右、右偏中等等。

简直没有共同语言。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，这算是一个什麼样的民族？这算是一个什麼样的国家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麼历史悠久，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，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。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，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，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。为什麼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，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，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？不但受外国人欺负，更受自己人欺负--受暴君、暴官、暴民的欺负。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。看到外国小孩，他们是那麼快乐，我从内心产生羡慕。他们没有负担，他们的前途坦落，心理健康，充满欢愉。我们台湾的孩子，到学校去念书。戴上近视眼镜。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，六亲不认。他母亲昏倒在地，他去扶她。母亲悲怆的喊：「我死了算了，管我干什麼？你用功罢，你用功罢！」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，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，学生马上就抗议：「我们不要学做人，我们要学应付考试。」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，从小就要斗，就要诈欺，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，就要满口谎言。多可怕的教育，我们要靠下一代，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。

我在台湾三十多年，写小说十年，写杂文十年，坐牢十年，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，平均分配。为什麼我不写小说了？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，要透过一个形式，一些人物，所以我改写杂文。杂文像匕首一样，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。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，你已经开错了，应该左转，应该右转，应该靠边走，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，前面有桥，应该放缓油门，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，有红灯等等。不停的提醒，不停的叫，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。掌握权柄的人认为：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，他就永远没有错误。

我自己在牢房裏沉思，我为什麼坐牢，我犯了什麼罪？犯了什麼法？出狱之後，我更不断的探讨，像我这样的遭遇，是不是一个变态的、特殊的例予？我到爱荷华，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，使我发现，像我这种人，上帝注定要我坐牢，不在台湾坐牢，就在大陆坐牢。

他们同我讲：「你这个脾气，到不了红卫兵，到不了文化大革命，反右就把你反掉了。」为什麼一个中国人，稍微胆大心粗一点，稍微讲一点点实话，就要遭到这种命运？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，我问他们：「你为什麼坐牢？」他们说：「讲了几句实话。」就是这样。为什麼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？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。前几天，有位从北京来的「全国作家协会」的党书记，我同他谈，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。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，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。但不能怪他，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，都不能责备，换了各位，在那个环境之中，纳入那种轨道之後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，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。我也会那样做。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，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。常听到有人说：「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裏。」我年纪大了之後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，事实上是，一半操在自己之手，一半操在别人之手。

一个人生活在世上，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裏的石子一样，运转起来之後，

身不由主。使我们感觉到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，而是文化问题。耶稣临死的时候说：「宽容他们，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」年轻时候读这句话，觉得稀松平常，长大之後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。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，才发现这句话多麼深奥，多麼痛心。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，我们的丑陋，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。我到爱荷华，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，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，再出私人捐助一半。

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，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，我们从前没见过面，捐了一个这麼大的数目，使我感动。他和我谈话，他说：「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，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，看了你的书之後，才觉得不是那麼一回事，所以说，我想请你当面指教。」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，我第一次出国时，孙观汉先生跟我讲：「你回国之後，不准讲一句话：唉！中国人到那裏都是中国人。」我说：「好，我不讲。」回国之後，他问我：「你讲得怎麽样？」我说：「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：中国人到那裏都是中国人。」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。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後，有所改变，想不到并没有变。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？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，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？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，这不是自找安慰，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，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，往往是中国人，许多大科学家，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，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、李政道先生，都是第一流的头脑。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，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、很快乐的境界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。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，国家不强大有什麼关系？只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後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。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。但是为什麼几百年以来，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？什麼原因？

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，那就是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，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，到今天都不能痊愈。有人说：「自己不争气，却怪祖先。」这话有一个大漏洞。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（按，[本鬼]），有梅毒的父母，生出个梅毒的儿子，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：都要吃药。有一次，儿子愤怒的说：「我不要这个药，我宁愿死。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麼样的身体？」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？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。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，假定我们要怪的话，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麼样的文化？这麼一个庞大的国度，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，却陷入贫穷、愚昧、斗争、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，难以自拔。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心裏充满了羡慕。这样的传统文化。产生了现在这样的现象，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。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、乱、吵。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。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。我们的厨房脏乱。我们的家庭脏乱。有很多地方，中国人一去，别人就搬走了。我有一个小朋友，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，嫁给一个法国人，住在巴黎，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，打过地铺。她跟我说：「她住的那栋楼裏，法国人都搬走了，东方人都搬来了。」（东方人的意思，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，有时候专指中国人。）我听了很难过，可是随便看看，到处是冰淇淋盒子、拖鞋；小孩子到处跑，到处乱画，空气裏有潮湿的霉味。我问：「你们不能

弄乾淨吗？」她说：「不能。」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，我们乱。经过这麼样提醒之後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、我们乱。至於吵，中国人的嗓门之大，真是天下无双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。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：两个广东人在那裏讲悄悄话，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，急拨电话报案，警察来了，问他们在干什麼？他们说：「我们正耳语。」

为什麼中国人声音大？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，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：只要声音大、嗓门高，理都跑到我這裏来了，要不然我怎麼会那麼气愤？我想这一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，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。因为吵、脏、乱，自然会影响内心，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，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

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，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。每一个单独的口本人。看起来都像一条猪，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：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。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，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，就在台北，三个日本人做生意，好，这次是你的，下次是我的。中国人做生意，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，你卖五十。我卖四十，你卖三十，我卖二十。所以说。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，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。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，下可以治国平天下。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。譬如在研究室里，在考场上，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，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。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，三巨条龙加在一起。就成了一条猪、一条虫，甚至连虱都不如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。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，中国人永远不团结，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，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，我只好说：「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麼意思？是上帝的意思！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，团结起来，万众一心，你受得了？是上帝可怜你们，才教中国人不团结。」我一面讲，一面痛彻心腑。

中国人不但不团结，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。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，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，任何一个华人社会，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，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。中国有一句话：一个和尚担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没水吃。」人多有什麼用？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。可是你说他不了解，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。我上次（一九八一）来美国，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裏，谈得头头是道，天文地理，怎麼样救国等等，第二天我说：「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。」他一听是张三，就眼冒不屑的火光，我说：「你送我去一下吧！」他说：「我不送，你自己去好了。」都在美国学校教书，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，竟不能互相容忍，那还讲什麼理性？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，是一项严重的特徵。

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，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中国人。

凡是出卖中国人的：也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中国人。凡是陷害中国人的，不是外国人，而是中国人。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：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，一下子被告了，告得很严重，追查之下，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，一块从中国来的，在一起打天下的。朋友质问他怎麼做出这种下流的事？那人说：「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，你现在高楼大厦，我现在搞的没办法，我不告你告谁？」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。譬如说，在美国这麼大的一个国度，沧海一粟。怎麼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？有人告你麼！谁

告你？就是你身边的朋友，就是中国人告你。有许多朋友同我说：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，你可要特别注意。特别小心，他不但不会提升你，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。因为他要「表示」他大公无私，所以我们怎麼能跟犹太人比？我常听人说：「我们同犹太人一样，那麼勤劳。」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，一个是，中国人的勤劳美德，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。几千年下来，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--勤劳，现在已不存在。第二，我们拿什麼来跟犹太人比？像报纸上说的：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，不得了啦，三个人有三个意见。但是，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，一旦决定了之後，却是一个方向，虽然吵得一塌糊涂，外面还在打仗，敌人四面包围。仍照旧举行选举！各位都现白，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，没有反对党的选举，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。在我们中国，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，可是，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，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。却是三个方向。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，有人提议到旧金山，表决决定到纽约。如果是以色列人，他们会去纽约。如果是中国人，哼，你们去纽约，我有我的自由，我还是去旧金山。我在英国影片中，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，有的要爬树，有的要游泳，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，表决通过爬树，於是大家都去爬树。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，因为民主不是形式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的民主是「以示民主」：投票的时候，大官还要照个相，表示他降贵纓尊，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。

中国人的不能团结，中国人的窝里斗，是中国人的劣根性。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，而是中国的文化中，有滤过性的病毒，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，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，明知道这是窝里斗，还是要窝里斗。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，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。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，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。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？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：「这件事我错了。」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。我女儿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我打了她，结果是我错怪了她，她哭得很厉害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，她只能靠父母，而父母突然一翻脸，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。我抱起她来，我说：「对不起，爸爸错了，爸爸错了，我保证以後不再犯，好女儿，原谅爸爸。」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。这件事情过去之後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，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，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。

中国人不习惯认错，反而有一万个理由。掩盖自己的错误。有一句俗话：「闭门思过。」思谁的过？思对方的过？我教书的时候，学生写周记，检讨一周的行为，检讨的结果是：「今天我被某某骗了，骗我的那个人，我对他这麼好，那麼好，只因为我太忠厚。」看了对方的检讨，也是说他太忠厚。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？那麼谁不忠厚呢？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。我们虽然不认错，错还是存在，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。为了掩饰一个错，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，再制造更多的错，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。所以说，中国人喜欢讲大话。喜欢讲空话，喜欢讲假话，喜欢讲谎话，更喜欢讲毒话--要毒的话。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，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。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，全都是大话、空话。我不再举假话、谎话的例子，但中国人的毒话，却十分突出，连闺房之内，都跟外国人不同。外国夫妻昵称「蜜糖」「打铃」，中国人却冒出：「杀千刀的」。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，毒话就更无限上纲，使人

觉得中国人为什麼这麼恶毒、下流？

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，後來改行做生意，有次碰到他，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？他说：「发什麼财？现在就要上吊！」我问他为什麼赔了？他说：「你不晓得，和商人在一起。同他讲了半天，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。」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：「和中国人交往很难，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裏什麼想法。」我说：「这有什麼稀奇，不要说你们洋人，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，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麼。」要察颜观色，转弯抹角，问他说：「吃过饭没有？」他说：「吃了」其实没有吃，肚子还在叫。譬如说选举，洋人的作风是：「我觉得我合适，请大家选我。」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：即令有人请他，他也一再推辞：「唉！我不行啊！我那里够资格？」其实你不请他的话，他恨你一辈子。好比这次请我讲演，我说：「不行吧！我不善於讲话呀！」可是真不请我的话，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，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。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，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。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，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。

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，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，跑来看我，他说：「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。」我说：「对不起，我还有约。」他说：「不行，一定要来！」我说：「好吧，到时候再说。」他说：「一定来，再见！」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，可是洋人不明白。办完事之後？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我说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英国教授说：「哎！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？要到他家去啊。」我说：「哪有这回事？」他说：「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。」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。

这种种情形，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，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。如果是平辈朋友，还没有关系。如果他有权势，如果他是大官，如果他有钱，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，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？这些都是精神浪费。所以说，有句俗话：「在中国做事容易，做人难。」「做人」就是软体文化，各位在国外住久了，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。做事容易，二加二就是四，可是做人就难了，二加二可能是五，可能是一，可能是八百五十三，你以为你讲了实话，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？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，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中打转。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，开任何会议时，我都可以坐在那裏睡觉，睡醒一觉之後，会也就结束。为什麼呢？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，听不听都一样。不只台湾如此，大陆尤其严重。今年(一九八四)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，写了一篇小说《真真假假》，推荐给各位，务请拜读。环境使我们说谎，使我们不能诚实。我们至少应该觉得，坏事是一件坏事，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，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，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。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，不是不光荣的事，甚至是光荣的事，这就造成一个危机，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。

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，不断的讲大话、空话、假话、谎话、毒话，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，不能开阔。中国的面积这麼大，文化这麼久远，泱泱大国，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麼样的心胸？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。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，只能在电视上看到。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？只要瞪他一眼，马上动刀子。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？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，中国人打一架可是

一百年的仇恨，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！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？

没有包容性的性格，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，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，不够平衡。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。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。自卑的时候，成了奴才；自傲的时候，成了主人！独独的，没有自尊。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，和权势走得越近，脸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。不屑一顾。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。

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，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。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，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。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，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。眼睛也花了，路也不会走了，因为他开始发烧。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。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，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，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；这些都是自我膨胀。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，车掌小姐说：「我们这位司机先生，是天下一流的司机，英俊、年轻。」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，同大家拱手致意。这就是自我膨胀，他认为他技术高明，使他虽不扶方向盘，照样可以开车。若干年前，看过一部电影。有一次，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，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，当他上塔之前，展示给大家看，全场掌声雷动。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，觉得伟大起来，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，接着就顺着梯子往上爬，他太太拉他说：「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」他说：「你懂什麼？」他太太追他，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。他到了塔上后，把盖子一盖，伟大加三级，再往下一跳，噗通一声就没有了。观众大发脾气：我们出钱是看飞的，不是看摔死人的，教他太太飞。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：「你膨胀的结果是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你的妻子。」

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，为什么容易膨胀？因为中国人「器小易盈」，见识太少，心胸太窄，稍微有一点气候，就认为天地虽大，已装他不下。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。还没有关系，假使全民族，或是大多数，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，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。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，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，我便是你的主人。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，死不认错。可是又不断有错，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。举一个例子来说明：台北有个朋友，有一次害了急病，被抬到中心诊所，插了一身管子，把他给救活了。两三天之后：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，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，就跟医生去讲，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。说：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，现在要转院呀。」於是不由分说，把管子全部拔下，病人几乎死掉，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，既悲又愤，我向他说：「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写文章揭发他。」他大吃一惊说：「你这个人太冲动，好事，早知道不跟你讲。」我听了气得发疯，我说：「你怕什麼？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，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，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？再说，他如果要对付的话，也只能对付我，不会对付你。是我写的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麼？」他说：「你是亡命之徒。」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，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人也很好，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，不愿意我去闯祸。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，这个也怕，那个也怕。

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，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，是一个中国人被抢，捉到强盗后，他不敢去指认。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。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

权利，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，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，总是一句话：「算了，算了。」「算了算了」四个字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，使我们民族的元气，受到挫伤。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，或者，我假如是一个暴君，对这样一个民族，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，真是天理不容。这种神经质的恐惧，是培养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温床，所以中国的暴君、暴官，永远不会绝迹。中国传统文化里--各位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，暴君暴官最喜欢，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，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。

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，是最灿烂的时代。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，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。到了东汉，政府有个规定，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、辩论、写文章，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，这叫做「师承」。如果超出师承，不但学说不能成立，而且还违犯法条。这样下来之後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全都扼杀、僵化。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，滴水不进。一位朋友说，「怎麼没有思考力？我看报还会发牢骚。」思考是多方面的事，一件事不仅有一面，不仅有两面，甚至有很多面。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，有一个球：一半白，一半黑，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，说它是个白球。另一边的人，则说它是个黑球，他们都没有错，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，而跑到另一边看，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。当我们思考问题时，应该是多方面的。

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，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，给学生一个气压计，叫他用「气压计」量出楼房的高度，意思当然是指用「气压」测量高度。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，偏偏不用「气压」，老师很生气，就给他不及格，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，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麼要那麼回答？他说：「老师要我用那个「气压计」来量楼有多高。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「气压」，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。」委员会的人问他：「除了那些方法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？」学生：「还有很多，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，再量绳子，就知道楼有多高。」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？」学生说：「还有，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，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，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。」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，他所显示的意义，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常使浆糊脑筋吓死。

还有一种「买西瓜学」，老板对伙计说：「你一出门，往西走，第一道桥那里，就有卖西瓜的，你给我买两斤西瓜。」伙计一出门。往西走，没有看见桥，也没有卖西瓜的，於是就空手回来。老板骂他混蛋，没有头脑。他说：「东边有卖的。」老板问他：「你为什麼不到东边去？」他说：「你没叫我去。」老板又骂他混蛋。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，服从性强，没有思考能力，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。假如伙计出去一看，西边没有，东边有。就去买了，瓜又便宜、又甜。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：「你太聪了，了不起，做人正应该如此，我很需要你。」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，会胡思乱想。各位。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，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。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，怎能独立思考？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，也恐惧独立思考。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，什麼都是和稀泥。

没有是非，没有标准。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。

这个文化，自从孔丘先生之后，四千年间，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，所有认识字的人，都在那裏注解孔丘的学说，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，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，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，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

存。这个潭，这个死水，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，酱缸发臭，使中国人变得丑陋。就是由於这个酱缸深不可测，以至许多问题，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，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。这样的死水，这样的酱缸，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。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，别人有民主，我们也有民主，我们的民主是：「你是民，我是主。」别人有法制，我们也有法制，别人有自由，我们也有自由，你有什麼，我就有什麼。你有斑马线，我也有斑马线-当然，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。

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，只有从现在开始，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。我们虽然不会演戏。却要会看戏，不会看戏的看热闹，会看戏的看门道。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。有七、八套，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，他当场拒绝，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，并不一样。我听了很惭愧，他就是一个鉴赏家。

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，从不揭露对方隐私，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，丧失选票。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，不但专门揭露隐私，而且制造隐私，用语恶毒。什麼样的土壤长什麼样的草，什麼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麼样的人。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，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，还去怪谁？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，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。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？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，使人痛心，选民在排着队选举，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，有人就问：「怎麼不给我呀？」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？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，不能靠别人赏赐。现在，常有人讲：「政府放宽多了。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自由、权利是我们的，你付给我，我有，你不付给我，我也有。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，就一定要争取选举。严格选择对象。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，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。能够怪谁？好比说画画，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，有人看到说：「这真好！」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，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？是你瞎了眼！是你没有鉴赏能力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。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：假画出笼，真画家只好饿死。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，只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。结果把门装颠倒了，主人说：「你瞎了眼？」裁缝师傅说：「谁瞎了眼？瞎了眼才找错人！」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。

没有鉴赏力。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
中国人有这麼多丑陋面，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。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，不是经济帮助，而是文化帮助。因为中国船太大，人太多，沉下去之後，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。在座的美国朋友，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。最後一点，我的感想是：我们中国人口太多，仅只十亿张大的口，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，使我们想到，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，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，我们就能鉴赏自己，鉴赏朋友，鉴赏国家领导人物。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，也是唯一的一条路。

谢谢！

酱缸国医生和病人

作者：柏扬

话说，从前，有个酱缸国，酱缸国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。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，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，大概情形是这样的：

病人：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大摆筵席，你可要赏光驾临，作我的上宾。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？

医生：对不起...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：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，恐怕是三期肺病：第一个是咳嗽.....

病人：怪了，你说我咳嗽：你刚才还不是咳嗽，为什么不是肺病？

医生：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。

病人：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有钱、有学问，上过大学堂，喝过亚马逊河的水，血统高人一等，是不是？

医生：不能这么说，还有半夜发烧.....

病人：不能这么说，要怎么说才能称你的心、如你的意？半夜发烧，我家那个电扇，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，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！

医生（委屈解释）：吐血也是症候之一。

病人：我家隔壁是个牙医，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，难道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！

岳生：那当然不是，而是综合起来.....

病人：好吧，退一万步说，即令是肺病，又是七八期肺病，又有什么关系？值得你大呼小叫！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？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。我下个月结婚，谁不知道，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，为什么要打击我？我跟你有什么怨？有什么仇？你要拆散我们？

医生：你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只是说.....

病人：我一点也不误会，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，你幼年丧母，没有家庭温暖，中年又因强奸案和某财害命，生了大牢，对公平的法律制裁，充满了仇恨，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，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。

医生：我们应该就事论事.....

病人：我正是在就事论事，坦白告诉你你当初杀人时，是怎么下得手的，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於你。

医士（有点恐慌）：诊断书根据你血液、唾液的化验，我不是平空说话。

病人：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，就等於你当初的刀子，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。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，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，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，你不觉得可耻？

医生：老哥，我只是爱你，希望你早日康复，才直言提醒，并没有恶意。

病人（冷笑兼咳嗽）：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，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和起来，阻止你在「爱」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。

医生：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，像唾液，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……

病人：崇洋媚外、崇洋媚外，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、贱骨头，我严肃的警告你，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。

医生（胆大起来）：不要乱扯、不要躲避，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，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麼关系？我们的主题是：「你有没有肺病」？

病人：看你这个「丑陋的中国人」模样，嗓门这麼大，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，怎麼说没有关系？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，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，因而看不起我们。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，天理不容，锦衣卫（努力咳嗽），拿下！

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（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），有时候是乱棒打出，有时候是口诛笔伐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，台北

骂

作者：柏扬

中国文字中最无法下界说的，莫过于「骂」，骂本来的意义应该是一种侮辱，你阁下骂了柏杨先生一顿，我准跳高。而柏杨先生骂了你阁下一顿，你也不会放过我，准回敬曰：「干你娘」。不特此也，叁国时，代诸葛亮先生在两军阵前，碰见王朗先生，几句「皓首匹夫，苍髯老贼」，王朗先生一听，大叫一声，活活撞死马下，这真是恒古之大骂。不过，骂之为物，用之於廉耻未泯的朋友，其效尚宏，这年头王朗先生者流不多，多的是正人君子 and 道貌岸然。诸葛亮先生如困生到现在，骂了半天，别人无事，照漾嘻嘻笑而笑嘻嘻，他自己死怕反而会大叫一声，活活撞死马下也。

主要的是，「骂」一入官场，其意义即大变特变。柏杨先生在官惠大学堂担任教习，教的就是「挨骂学」，对此有精辟的阐扬，有志之士，可往旁听。夫「挨骂为升官之本」，有些人想挨骂还不可得。盖你收了红包的结果，如果不是挨骂，而是法律裁判，就一切都完了蛋矣。我们家乡有句俗语曰：「打是亲，骂是恩」，指父母对子女而，言而能给你官做的人就是父母，被人给官做的就是儿子孙子重孙子。君读明史，读到明末种种镜头，一定拍案叫绝。魏忠贤先生不过一个被阉割了的地痞，可是因他可以给人官做，中央文武百官以及地方文武百官，几乎全都拜在他的脚下当乾儿子乾孙子乾从孙子，挤不到子孙圈里的官，便如丧考妣，以头碰墙，恨不得吃两斤巴松。既有如此跳圈之狂热，则像二「章」先生那种操他的妈，或罚他的跪，不但不是侮辱，简直是一种异数。有些人在子孙圈之外徘徊流涕，想自己的妈被操，想跪上一年半载，还没有人肯下手哩。

时代进步，骂也跟着进步，操妈罚跪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内容遂变得十分复杂。有那麼一天，我在街上过见一个场面，两位都是从小汽车里钻出来的人物，无眼镜的问曰：「老板叫你去干啥？」戴眼镜的答曰：「挨了一顿骂，惨啦，惨啦。」我当时就告老妻曰：「记住那家伙，他马上就要升官。」老妻

不信曰：「挨骂的人还能升官？你真老糊涂。」愚妇之见，真是可叹。果然，前天翻报，升官图中有他的玉照。

盖挨骂学的精华全在於，此那就是说，老板大人呀，请瞧请瞧，你操我妈也，罚我跪也好，我仍然狂热的爱你忠，你不给我官做，你狗崽的还有天良乎？而老板大人也是如此想法，我操他妈，罚他跪，他都不变，安全可靠，莫此为甚，我不给官，给王八蛋官乎。壮哉，一到末世，就安第一。古书上可惜没有写出顶撞李鸿章先生那位知府的姓名，否则我敢打包票，他准没有前途。想当官的朋友必须把握此项秘诀，第一步是先往子圈里跳，第二步是取得挨骂格，第叁步是使老板自觉他是黄天霸，第四步是「挨骂学」、「买西瓜学」、「难得糊涂学」、「一脸忠贞学」出笼。包管你明天就坐在大办公桌之，向周弃子先生埋怨曰：「这局长真不是人干的。」你敢跟我赌一块钱哉？

一个人甘心当奴才，甘心被骂，是他真的「忠贞在此，诸神退位」乎？当然也有一种祖传的奴才胚，以当奴才为荣的，不过恐怕是大多数都另有天地。不管你怎麼整我，只要能给我官做，我就兴兴头头，前仰後合。於是，所有的看家本领，就在这种情势下，五光十色，大批出击。有些人一看小官崽大衣而车门，就大叫不得了啦，不知道在暗室之中，小电影的节目还更为精彩，这是时代的需要，无可奈何者也。有一个问题在焉，有心的人不妨四打听，在中国历史书上，几乎到都有责备别人「忘恩负义」的宣言，不外是某人焉，原来没饭吃，要不是我拉他一把，早饿死啦，可是他忘恩负义，骂他两句竟不肯接受，某人焉，原来当课的，我连升他八级，教他当处长，可是他忘恩负，竟不跳楼。呜呼，只要随便走走，所碰见的，简直全是这种有於人的人，而所感叹的，又无不是别人如何如何的忘恩负义。人听啦，好像中华民族忘恩负义的风气特盛，真是毛骨悚然。

幸而事实上颇有研究馀地，人是有权力欲的，罗素先生有一本巨「权力论」，认为权力是人类进化的动力，和唯物论，唯心论，鼎立而成为第叁种学说。所以人们对权力的来源，无不诚惶诚恐。该来源如果是选民，则他忠选民。该来源如果是君主，则他忠君主。该来源如果是柏杨生，他忠柏杨先生。该□源如果是官崽二抓牌，则他效忠官崽二抓牌。这里面最大的分野是，效忠於选民，他可以维持他人性的尊严。如果效忠於杨先生，我既操他妈又罚他跪，必要时还要他闻屁□粪，他的自尊心恐怕很难维持。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，要想他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一样，倔强不变，可乎？在另一方面，使人最大的困惑是，明明用的是奴才，□异想天开，希望该奴才像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。从前对人，以国土待之，则国土报之。而今对人，以奴才待之，□希冀以国土报之。用玩奴才的手段去结死党，怎不到处喊人心不古哉？一个月几百几千薪金雇别人的劳力，到时候□要他从十八层楼往下跳，不跳就是忘恩负义，如果颠倒过来，老板大人阁下自己往下跳乎？即令有格外的施恩，已用格外的谄媚报答之矣。人的性格是一贯的，他为啥向你低头？为啥你操他妈罚他跪他还满面红光？是因为你给他官做，一旦你稀里花拉，不能给他官做啦，再想如法炮制，自然不接受，盖他去找别的能给他官做的人啦。这个道理，比柏杨先生张口向你阁下借一块钱，都明白，没啥好商量的也。

中国知识份子走的路，两千年来，都是固定了的，咬定一个主子，吃人一碗赏下来的饭，不但没有第二路可走，而且除了这一条路外，想活下去都有点困难。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「人生以做官为目的」的地下哲学，一切

为主子服务矣。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位，应推叔孙通先生，研究他一生的奇遇，可看出中国六化所缺少的灵性到底哪里去啦。他阁下原来是秦王朝的「待诏博士」，陈胜先生揭竿叛变後，消息传到咸阳，二世皇帝嬴胡亥先生表示民主，特向大家征求意见，诸生参十余人说老实话曰：「人臣无将，将则反，罪死无赦，愿陛下发兵击之。」嬴胡亥先生一听，勃然大怒，叔孙通先生瞧在眼里，一脸忠贞学出笼，急忙奏曰：「诸生解皆非，夫天下一家，毁郡县城，铄其兵，视天下弗复用，且明主在上，[柏杨先生按：这一巴掌拍的结实]，法於下，吏人秦职，四方辐辏，安有反者？此特群盗鼠窃，何足置齿牙哉。邵守尉令捕诛，何足忧。」嬴胡亥先生是一个短命鬼，当皇帝不到叁年，就被子孙圈中坚份子赵高先生一刀，戳穿尊肚。满朝文武似乎只有叔孙通先生摸了个准，盖昏庸骄横的家伙，最大的特徵是喜欢听顺耳的话。诸生们老老实实说真话，嬴胡亥先生当然大怒，「这种地头蛇头目，中国多的很，荦荦大者，又有二人焉，杨广先生和朱由检先生是也」，叔孙通先生信口雌黄了一顿，就立刻浑身舒服。史书上说，嬴先生马上就赏了他二十匹西服料，一件大衣，另外，升他为正式「博士」。

叔孙通先生回到家里，那些大败的人心里不服，找他理论，问曰：「陈胜明明是叛变，你为啥说了一大堆，不嫌谄媚得过火呀？」请看他阁下如何应对，答曰：「你们不知我也，我不把他弄得晕晕忽忽，而像你们一样，也说真话，咱们今天还能平平安安回家哉？」这是一个千古不灭的镜头，上下交相骗，而国砸矣。嗟夫，我们能责备叔孙通先生骗乎？地头蛇一手拿着皮鞭，一手拿着「帛二十匹」、「拜为博士」，威迫利诱，逼你非骗不可。换了柏杨先生，左一思，右一想，恐怕说出来的话，比叔孙通先生还要使他阁下过瘾。但叔孙通先生高明的地方是，他在升官发财之後，并没有鬼迷心窍，沾沾自喜，看准了秦王朝马上就要打烊，乃卷起行李，逃之夭夭，投奔别的主子去啦。大概他的霉气未退，所投奔的对象，一个个也跟着打烊。先投奔薛，薛已降楚，再投奔楚，楚又灭亡。辗转了若干年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最後归汉，刘邦先生瞧他穿着儒生衣服，又宽又大，幌来幌去，简直从心里讨厌。叔孙通先生何等聪明，就立刻改装，短衣短裤。

叔孙通先生跑来跑去，并不是孤伶伶的跑，而是有一群学生——以他为首的子孙圈，在他的屁股後，跟着跑。希望有朝一日，刘邦先生给老师一个官做，以便吃菜的菜，喝汤的喝汤。可是想不到叔孙通先生不但不向刘邦先推荐他们，反而把些叁竿子打不着的强盗匪徒之类，硬往里拉，於是学生全体哗然，且看史书上如何写吧，汉书云：「通[叔孙通]之降汉，从弟子百余人，然无所进，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。弟子皆曰：事先生数年，幸得从降汉，今不进臣等，专言大猾，何也。」大猾者，知识份子瞧不起粗线条，口头上占便宜的话也。叔孙通先生解释曰：「刘邦现在拼命打天下，你们能斗一下？当然先推荐泼皮亡命之辈。各位同志且稍安勿躁，我忘不了你们。」果然，刘邦先生拳打脚踢，搞出了一个王朝，当了皇帝。而皇帝也好，大臣也好，将军也好，当初大家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，不分彼此，咬耳朵摸屁股的朋友，天下是大家打下的，要高兴当然一齐高兴，「群臣饮宴争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剑击柱，」把刘邦先生搞得焦头烂额。叔孙通先生抓住机会，建议「共起朝仪」，共起朝仪的结果是刘邦先生大悦，曰：「俺今天才知道当皇帝之妙也。」於是，叔孙通先生趁着主子大悦之际，缘竿而上，把他的学生荐了上去，刘邦先生乃一一发表他们为「郎」，「类似现在次长、司长、科长之

类的官」。叔孙通先生也真会做人，刘邦先生不是赏了他五百斤黄金乎？他也转送给学生，学生欢呼雷动，赞曰：「叔孙先生真是圣人，知当世务。」

我想读者先生现在可以了解「圣人」的定义矣，圣人者，「知当世务」，能弄到官做，也能给人官做之人也。社会上很多奇异的事情，便由此发生，在洋大人之国，不学一定无术，而在我们中国，不学硬是有术，谁使他有术乎？官使他有术也。那也就是说，官就是圣人，官大啦，道德学问也跟着。大有很多场合，大官崽端着嘴脸，猛训小官崽曰：「你看的只是局部现象，而我看的是全局，我必须考虑到全局。」直把小官崽训的张口结舌。其实他懂得啥叫全局？他如果有眼光看全局，早买麻绳上吊矣。他的哲学根据就是官大学问，大盖远在两千年之前，叔孙通先生起，圣人就和官崽结合，化而为一，弄得既官且圣，既圣又官。一旦柏杨先生的洋女婿，[按：柏杨先生令媛於前年和美国一位擦皮鞋的纽约隆重结婚，好不可羨。读者先生不必送礼啦，原地肃立致敬即可啦]，只要由他向当朝一品提一提他岳父如何如何，依目前风气，凡洋大人一提的，无不身价十倍，则我当个地震局局长，准不成问题。走马上任之後，用不了叁天，我就是地震专家矣。盖只有手中有权，便是圣人，说啥都懂，训起人来，头头是道。

叔孙通先生最大的功劳是代编字典的「圣人」定义，要想当圣人，非有权给人官做不可。有权给人官做，才能玫训词而勉後进，否则便不值一文也，不要说社会上啦，就是在至高的大学堂里，年头也有不对，柏杨先生想当年念书时，对教习们由内心发出敬意，老师布鞋长发，棉袍上都是补钉，敬意反而更增。现在恐怕不太简单，一个有权给学生官做，或有力把学生弄出国的教习，才有份量。别瞧把孔丘先生恭敬的昏头转向，那是孔丘先生死啦，如果他阁下还活着，去国立台湾大学当教书试试，恐怕没有人听他「言寡尤，行寡悔」那一套。

除了为「圣人」下定义外，叔孙通先生还作了一件启示，那就是老板大人和子孙圈的关系，在於能不能给他们好处，诸生追随叔孙通先生东跑西跑，总算死心塌地矣，书上虽没有详加描写，但主奴间的感人事，一定很多很多。可是逐渐的他们不耐起来，来了个窝里反，群起而向老师提出质问。幸亏老师身怀绝技，不负众望，否则僵到最後，一哄而散，那才精彩。故任何老皮大人必须有官在手，前面不是提过明末皇帝朱由检先生乎，别看他凶暴起，恶气冲天，一旦李自成先生进了北京，他阁下没猴子玩啦，再不能给人官做啦，大家立刻就表演「众叛亲离」，以致他亲自敲钟召集百官，都没人理。历史上对该现象十分浩叹，其实没啥可浩叹的，怎样聚，怎样散，没有把他绑起来献给新老板已算高级文化矣。

韩非子曰：「王者与师处，霸者与友处，亡国之君，与奴隶处。」开创大局的领袖，尊敬他任用的人，像周武王姬发先生对姜子牙先生，尊之为尚父；像齐桓公姜小白先生对管仲先生，尊之为仲父；像汉昭烈帝刘备先生对诸葛亮先生，甚至表示把政权都愿让给。他其次则把他用的人当作朋友，这例子多如牛毛，刘邦先生和萧何、韩信、张良，一直是穿一条裤子的关系；苻坚先生和王猛先生，一见倾心，成为至友；李世民先生的左右手，也都情若兄弟。可是，「亡国之君，与奴隶处。」呜呼，创业之世，用人唯才，年长者成了老师，年轻者成了朋友。等到政权稳定，进入守成，用人便不管才不才啦，只瞧瞧资格如何，这就开始发僵。等到末世，天下大乱，用人安全第一，就只有子孙圈矣，子孙圈中人都是靠聪明而被赏饭吃，而不是靠智慧换

饭吃的，老板大人左一看焉，一堆谄媚的脸，颂他天纵英明；右一看焉，一群举业的脸，颂他不同凡响。他怎能不飘飘然而晕晕忽，偶尔操操妈，罚罚跪，自理所当然。

买西瓜学

作者：柏扬

郑先生的难得糊涂学精义，在於他并不否定聪明，你别看那些高官贵爵一个个脑满肠肥，固无一不是绝顶聪明之人。也必须有绝顶的聪明，才能装恰到好处的糊涂。如果他根本没有聪明，跟猪一样，有啥可取的？如果他的聪明成份不够，装起糊涂来不能恰巧好处，也不会有啥前途。於是一切二抓学问，从此而。出试举一个例子说明，好比说柏杨先生忽然大权在握，可以给你官做啦，有一天，我教你去买一块钱的西瓜，并面授机宜曰：「你出得大门，往南走，约二里处，一瓜摊在焉，有个老太婆在那里卖瓜，一块钱一斤，快去快回。」你阁下听了我面授的机宜之後，心中不禁笑曰：「这个混蛋老头，往南走叁千里也没有卖西瓜的。」

然而成败就在这里分晓，心里笑归笑，你的嘴脸必须严肃的表示对柏杨先生敬如神明。

然後出了大门，头也不扭，迳往南而去，一面赴一面骂曰：「这一带都是无主乱坟，西瓜在何方？哼，狗屎倒不少。」走了足足一个小时，[你如果有雅兴的话，去找妓女小姐风流一个小时亦可，]然後垂头丧气回来，[注意「垂头丧气」四字，精华在此。]见了柏杨先生，立刻面色苍白，气喘如牛，作愤怒而又害怕之状，结巴曰：「南边没有卖西瓜的呀，我找了一小时，腿都跑断啦。」柏杨先生大怒曰：「混蛋。」你曰：「是是是。」柏杨先生仍大怒曰：「王八旦。」你曰：「是是是。」这时候你阁下脖子上最好适时的流出点汗水，以示恐慌，双膝最好再努力发一点抖，以示紧张。柏杨先生瞧在眼里，龙心满意，乃曰：「你往北找了没？」曰：「没，没有。」柏杨先生曰：「为什么不找？」你曰：「你老人家没，没，没教我往北呀。」柏杨先生乃跳高而开台湾之省骂曰：「干你娘，简直是猪，存心把朕气死，你还有资格作官？锦衣卫，拿了。」於是你诚惶诚恐，如丧考妣。

写到这里，性急的朋友一定沉不住气，瞪眼曰：「你既教人头也不扭，又教人垂头丧气，弄得如此结果，真是麻子不叫麻子，叫坑人也。」其实妙就妙在这里，盖观察二抓牌有没有前途，不能从他被踢不被踢上看，须从他有没有圈圈上看。这不是说圈里人便永不会被踢，圈里人搞得太恶形恶状，照漾会被免职让位，但与圈外人不同的是，圈外人一旦被踢，那是真正的被踢，想再爬起来恐怕是难难难难难难难。而圈里人便不然矣，被踢固然被踢，但过了几时，等到主愤平息，照漾有得官做。明白这个原则，柏杨先生虽教锦衣卫把你阁下「拿了」，尽管放心，第二天，我的龙心一想：「咦，他不过脑筋不灵活罢了，这种买油钱不能买醋的人，最忠贞可靠。」说不定马上就派你当军机大臣，你就有得混也。

我刚才强调「头也不扭」，就是郑板桥先生「难得糊涂学」里重要的一章，想做官的朋友应特别注意，「头也不扭」的学问大啦，你不扭头，是表示你听话，你如果一扭头，就糟到了印度国，会教你後悔的巴不得没有从娘胎里生下来。盖扭头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一扭头，必然看见北边有一个西瓜摊，该摊的西瓜，又圆又大，又甜又嫩。你如果做官艺术非常之高，急忙再把尊头扭回来，假装没看见，也不被别人发现，那算你叁生有幸。万一叁生不幸，被发现，打了小报告，说你「心怀叵测」，「奸险阴□」，你的官就得垮。如果你做官艺术不，高认为柏杨先生不是教你买西瓜乎？往北买同漾是买，何况明知南边没有西瓜哉。

於是你往北买啦，又便宜又好，一块钱买了叁百八十斤，吃一口能香死人。柏杨先生大嚼之後，当然对你大加称赞，说不定立刻就升你当吏部侍郎。可是，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，当天晚上，夜静更深，我心里想曰：「他能干固然能干，但他有脑筋，能判断，而有脑筋能判断，就是一种危险。」想到这里，打了一个冷颤。好啦，不用多久，就有一个人抓住你的小辫子一摔，你就尊嘴啃地。

至於要你努力「垂头丧气」，其用意也是如，此一则表示你买不到西瓜时内心的痛苦——想起来给你官做的柏杨先生口渴发毛，而你又爱主情，切当然心中有戚戚焉。一则也避免发现北边那个西瓜摊。如果你精神饱满，挺起脊梁，昂然而进，别人瞧见，咬我的耳朵曰：「你看，他没有达成任务，还高兴哩。」这还用打听啥结果乎？或者是你在回来途中，走着走着，猛一抬头，前面有卖西瓜的呀，不禁叫曰：「老头真是糊涂，明明北边有，偏说南边有，教我跑冤枉路！」教你跑冤路？噢，就凭你这种想法，明明不服气我天纵英明，更不服气我是大思想家以及大什麼家，我不教□衣卫送你顶帽子，已经够皇恩浩荡啦，你还想当官往上爬呀。

吾友苍颉先生想当年造字，鬼神曾经夜哭，盖□尽宇宙精华。因文字之产生，人间就有更多麻烦，更多悲惨。柏杨先生如今发明了「买西瓜学」，据说鬼神不但没有夜哭，反而欢声雷动，观察家并且发现他们有为我为造一个铜像的可能。盖这种学问，有志之士，只要照着葫芦画瓢，无不前途辉煌，犹如一盏明灯，悬在高处，照得做官之路，如同白昼，尽管闭着眼睛往前走就成啦，用不着左碰右碰，碰了个头肿脸青，还不知道原因何在哩。

一个人必须彻底明了这种学问，才能对历史上许多奇怪现象，获得解答，否则的话，一辈子都是一盆浆糊。一些正人君子，差不多每天都鼓励别人精忠报国，老帝崽赵构先生更亲笔写了该四个字赠给岳飞先生，而岳飞先生竟也当成了真，把它刺到背上，这一场精忠报国的结果，国人皆知之矣。还有一个较小的例，似乎也可以介绍，晋王朝时楚王司马玮先生奉诏发兵杀汝南王司马亮先生，等到把司马亮先生杀掉之後，当皇帝的司马衷先生和当皇后的贾南风女士，翻脸不认账，说司马玮先生「矫诏」，逮捕斩首。司马玮先生临死时把皇帝亲笔写的诏书拿给行刑官看，泣曰：「这是假的乎？」行刑官看啦，不禁落泪，然而有啥办法哉？

这种学问流行的结果，反淘汰的酱缸文化遂不可收，拾历史上，多半是忠臣义士和英雄豪杰，才受杀受辱。盖国家越危险，越濒临覆亡，爱国志士越是心如火焚。眼看大厦要塌，忍不住伸手扶一把；眼看巨楼要倾，忍不住叫喊一声。这一扶和这一喊，便完全违反「买西瓜学」和「难得糊涂学」的神圣原则。呜呼，当大家都非常舒服的时候，偏你有见解有判断，你不危

险，难道我危险乎。

一个中国人几乎从懂事那一天起，就有人扭住耳朵，教训个没完。不外鼓励他爱国爱乡，公平正直，不畏强梁，坚持真理。从小到老，如果把每天所听到的教训加起来，恐怕至少可装十火车。而困惑也就因此而生矣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有一子焉，出国的前夕，他们在家开惜别座谈会，偏偏我碰上前去串门，看他们桌上摆了一巨盘鸭蒸肝鸭翅膀，又有老酒，便也挤而坐之，喝了两盅，听老头训子曰：「我儿，做人做事，要光明磊落，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，咬定牙齿，择善固执，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和国家民族，不要管别人的看法。」作儿子的坐在一旁，面色严肃，洗耳恭听，唯唯答应，老头话匣子一开，简直有说参天的趋势，我忍不住插嘴曰：「老哥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古书上都有，去书店买一本名人格言语录之类瞧瞧，上面固多的是。不过我要问你，年轻人如果真的照着你的指示去干，你知道将产生啥结果乎哉？」

呜呼，二十六史就摆在架子上，只要有工夫去翻，随时都会发现圣人的教训简直实践不得，一旦有人真的遵话炮制，就要流年不利。闲来无事，你不妨姑妄猜猜，历史上被杀被辱的，是忠臣多乎？抑奸臣多乎？实在是难开尊口。圣人教你爱国，好吧，你爱国试试，因为你爱之切，所以责之苛，因为责之苛，二抓牌自然嘿嘿冷笑。好像一条木船，有人凿洞，你喊曰：「不要凿啦，再凿就沉啦。」有人用淡水洗澡，你喊曰：「不要洗啦，再洗就全体渴死啦。」有人把帆布剪下做西装，你喊曰：「不要剪啦，再剪船就走不动啦。」有人把桨锯下做梳妆台，你又喊曰：「不要锯啦，再锯寸步难行啦。」全船只听见你阁下一个人嗓门，好像就你聪明，别人干这也不对，干那也不对。嗟夫，你不会被扔到海里，难道凿洞锯桨同志被扔到海里乎？那些凿洞锯桨同志，一个个都是忠贞之士，信心坚强，认为船永不会沉，你要是向他一提「沉船」，他尊脸上的青筋立刻暴起叁寸，吼曰：「你说啥？船会沉？你是何居心？」

其实，正人君子聪明齐天，其了解比柏杨先生深刻的多矣，大多数中国人努力的目标只是「当官」，而不是当英雄豪杰。但正人君子比柏杨先生□高明一倍，他们不但不肯把心里想的放到桌面上，反而另外准备了一套专门放到桌面上的话，随时随地，登台演奏。於是，没有一个人的嘴巴不是崇敬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的，但大多数心理并不心甘情愿去当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。如此这般，口心不一，你骗我，我骗你，看起来把别人骗住啦，实际上谁都骗不住谁。不过谁也不肯用手把表面上糊的那层白纸戳破，结果大家靠着那层白纸过日子，都假装着不知道白纸底下有脓血交流的烂肉。在这种局面下活着的人，自然知道怎麽选择矣。

夫「官」是啥？有人说是「公仆」，到目前为止，恐怕还不见得。我想对「官」字下定义下得最正确的，蒲松龄先生是其中之一，君看过聊斋志异上的「夜叉国」乎？话说徐先生乘船出海做生意，一阵大风，把他阁下吹到夜叉国，娶了一位夜叉太太，生了二子一女。有一天，夜叉太太携一子一女，出去打麻将时，徐先生思家心切，就和大儿子徐彪先生开溜。

回家之後，徐彪先生做官做到「副将」。又有一天，一个商人在海上也被大风吹到夜叉国，见了徐彪先生的弟，弟乃告之曰：「你哥哥做了官啦。」弟弟曰：「官是啥玩艺？」现在且听听该商人的介绍词。他曰：「出则舆马，入则高坐堂上，一呼百诺，见者侧目，侧足立，此名为官。」如果经柏杨先生翻译成白话，你就更会心跳，曰：「出则汽车飞机，欢呼迎送，宴会训话。」

入则高坐办公桌後，签字盖章，红包滚滚，权势滔滔，见者裂嘴而笑，半屁而坐，为之拉车门而穿大衣。此名为官。」英雄豪杰的辱戮如彼，二抓牌的光彩如此，还有啥可说的。

官既然如此之妙，要想人不选择它，而去选择下场必糟的道路，恐怕有点违反人性。吾友纪德先生曾曰：「当你在气质、灵性、见解、判上，愈进步的时候，你所获得世俗的荣耀越少。当你在权势、金钱、地位、官职上，愈进步的时候，你所获得世俗的荣耀越多。」似乎是古今中外一也。於是遂呈现两个极端，一个极端是既倒楣又遭殃的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，另一个极端是既富且贵，又阔而抖之的官惠群。夫「官」是坐汽车，乘飞机，训话签字，去外国落户传种的唯一捷径，教人之不爱之若狂，可乎！

有一种现象，玄妙异常，读者先生天天看报，不知道注意了没有？每一新官出笼，报上必大为卖劲，官大的，报上所卖之劲大，连祖宗叁代都写了上去，至於生而不凡，异禀异样等等，更不在话下。官小的，报上所卖之劲亦小，不过登张照片，吹吹他过去干过啥就行啦。一个人当官也好，升官也好，当然热闹一番，不过如果只在圈里热闹，我们没啥可讲，一旦上了报，便与小民有关了矣。柏杨先生每看见报上这类照片，或看见其庄严的姓名，便不由看得发怔，又敬又羨，眼前遂浮起各种影子——有汽车的影子焉，有洋房的影子焉，有报刘一丈书上那种「厚我厚我」的影子焉，有官场现形记上那种「黄豆汗珠」的影子焉，有出国考察、视察、开会、存款的影子焉，有端起嘴脸训话，教我们小民忠君爱国努力工作的影子焉，便不由的七魄荡荡，叁魂渺渺。

看起来夜叉国对官的介绍，还不够淋漓尽致。只有一点颇为精彩的，那就是官之所以动人心魄，全因为官和物质享受不可分，黄道周先生当初如果不是被清军活捉，而是坐着八抬绿呢大轿，则虽然是他卖了国，当了汉奸，但他的遭遇，你说能相同乎？大汉奸洪承畴先生，史书上只记载他母亲骂他，夏曾佑先生骂他，还有别的几位忠臣烈士骂他，好像人人都在骂他，实际上他那时的官大矣，曰「武英殿大学士」，曰「七省经略」，报上不但登他的照片以及祖宗叁代的照片，恐怕连祖宗七代的照片都得往外冒。他阁下驾到之处，所受的荣华富贵，黄道周先生能望其项背哉。

凡享大福的，都是精通「难得糊涂学」的官，以秦桧先生而论，很多人虽然不肯明言，但心里恐怕都有此一念，当秦桧要比当岳飞容易得多，也舒服得多。北伐不北伐，「二圣」还不还、小民水深火热不水深火热，关俺屁事？尤其是所谓「二圣」，当儿子当弟弟的赵构先生都巴不得他们砍头，秦桧先生又何必念念不忘？可惜宋王朝时代没有报纸，否则找本合订本看看，恐怕岳飞先生准被攻击得狗屁不值，专栏焉，社论焉，特写焉，正人君子的谈话焉，影印出□的通敌叛国证据焉，万人唾骂的通电来信焉，包管天天都是满版。呜呼，当岳飞先生被明正典刑之，日报上一定登出秦桧先生出席啥会，向与会人士，呼吁团结救国的消息，你敢和我老人家赌一块钱乎？

好啦，最後说一件故事，以告结束。宋王朝初叶，姑苏太守吴伯举先生，被当时的巨号二抓牌蔡京先生非常欣赏，一年之中，连升叁级，做到「中书舍人」，他如果有柏杨先生这两下子，善尽昧天良而猛拍马屁，早不得了啦。可惜他竟没有柏杨先生这两下子，不得不垮了下来。有人为他向蔡京先生讲情，你猜蔡先生说啥？他曰：「既要作官，又要作好人，两者可得兼耶？」噢！

难得糊涂学

作者：柏扬

昨天有一位朋友，到柏府串门，对这几天研究英雄下场的大作，伤心曰：「你这么一说，英雄豪杰都没有好下场，好像古人都没有你聪明。」呜呼，他实在是太低估了古人的大智大慧，难道用得着柏杨先生千百年後哎哟一声，众人才恍然大悟哉！我们老祖宗时代，便早有此发现，不过大家已经被酱，知而不说，不像柏杨先生穷极生疯，泼皮胆大，刚刚一知半解，便赶紧拉开嗓子乱嚷。君不见，乎真正的仁人君子，和识时务的俊杰，对任何英雄豪杰的勾当，都不会去干。种玉麟先生之放洋，有人笑；六君子之死，也有人笑。前不已言之，人人都称赞岳飞，可是如果请他阁下当岳飞，他恐怕吓得稀屎都拉出来。你如果一时心血来潮，冒险犯难，别瞧朋友在公开场合恭维你，关得门来，有得笑你傻也。苏东坡先生曰：「他人生子要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，但愿我子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」贵阁下明白了吧，在酱缸里，只有有愚且鲁的人有前途稍微有思想见解骨气才能的人，便只合有数不尽的灾难。

苏东坡先生的愚鲁政策，千万不能依字面解释，如果依字面解释，则历代下来，林林总总，大小官崽二抓牌岂不一个一个都是白痴乎？呜呼，谁要说他们是白痴，谁连白痴都不如。郑板桥先生曹在这上面悟出「难得糊涂」的学问，早柏杨先生一百年，真是了不起的人杰也。他阁下是清王朝中叶人，酱缸文化一直酱了两千年，才被他戳破了一个小洞，使我们後生小子，有所遵循，诚功德无量，伟矣大矣。柏杨先生从前曾想办一个「做官之道函授学堂」，後来改为「做官大学堂」，又改为「官崽大堂」，「二抓大学堂」，将来会不会四改五改，我不知道，不过不管名称怎麽改，我发明的那些种种升官固位的学问，依然价值连城，如果再加授「难得糊涂学」，就更包罗万象。郑板桥先生真算看穿了中国官场，也看穿了酱缸。

郑先生开宗明义曰：「聪明，难糊涂，难由聪明而糊涂更难。」柏杨先生小时候读之，简直越看越不懂，心里想，聪明当然难，遇到一个算术题，呆瓜算了叁天都算不出，而柏杨先生一算就出，是呆瓜这种人值钱乎？抑柏杨先生这种人值钱乎？是该呆瓜有前途乎？抑柏杨先生有前途乎？而郑板桥先生硬是瞪着眼说聪明没啥了不起，反过来糊涂虫倒难得难得，教人拼老命都想不通。

敲门砖学

作者：柏扬

儒林外史第十叁回「马纯上仗义疏财」，写的是马二先生的故事，马二先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份子代表人物，他对蘧公孙先说的那段话，真知灼见，惊天地而泣鬼神，世人不可不焚香拜读，书上曰——

「马二先生问道：『先生名门，又这般大才，久已高发了，因甚困守在此？』」公孙道：『小弟因先君见背的早，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，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。』」马二先生道：『你这就差了，「举业」二字，是从古及今，人人必然要做的。就如孔子，生在春秋时候，那时用「言扬行举」做官，故孔子只讲得个「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」，这便是孔子的举业。讲到战国时，以游说做官，所以孟子历说梁齐，这便是孟子的

举业。到汉朝用「贤良方正」开科，所以公孙弘、董仲舒就举贤良方正，这便是汉人的举业。到唐朝用诗赋取士，他们若讲孔孟的话，就没有官做了，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，这便是唐人的举业。到了宋朝又好了，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，所以程朱就讲理学，这便是宋人的举业。到本朝用文章取士，这是极好的文法。则就是孔夫子在而今，也要念文章，做举业，断不讲那「言寡尤，行寡悔」的话，何也？就日日讲究「言寡尤，行寡悔」，那个给你官做？」一席话，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，留他吃饭，结为性命之交。」

呜呼，不仅蘧公孙先生如梦方醒，便是柏杨先生也如梦方醒，读者先生中如有人知道马二先生住址的，务请来信见告，我不但要留他吃饭，结为性命之交，而且还非请他当官惠大学堂校长，兼授他的「敲门砖学」，以明义理不可。夫举业者，做官的敲门砖也。要想做官，就得认清时务，在言扬行举的时代，我就言寡尤，行寡悔。在游说时代，我就周游列国，舌如弹簧。在贤良方正时代，我就贤良方正。在诗词歌赋时代，我就既作诗又填词。在理学大盛时代，我就连女人都不看。在八股取士时代，我就努力八股。惜哉，一时尚找不到马二先生，无法请就明王朝以后的时代指出当行的举业。但依其「敲门砖学」精神类推，以后到了袁世凯洪宪时代，柏杨先生就努力赞成帝制，至少也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，表示非有个皇帝出来不能救中国。到了云南起义，再造共和时代，柏杨先生自然跟着义愤填膺，同样的也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，面不改色的曰，那些赞成帝制的人都是王八蛋。之后，到了东亚共荣圈时代，柏杨先生的举业就是喊天皇万岁矣，否则那个给我官做？壮哉，「那个给我官做？」对小孩子来说，有奶便是娘。对二抓牌来说，能给我官做的就是主子。於是耶稣先生的八福又多了一福，曰：「有权给人官做的有福啦」，撒下了大圈圈小圈圈，黄圈圈紫圈圈，自己高坐在上，看那些举业朋友，以头撞之者有之，以屁股顶之者有之，以钢钻钻洞者有之，以忠贞学挖窟窿者有之，以听话学巩固地盘者有之，热闹哄哄，好不过瘾。

人才

作者：柏扬

社会上嚷嚷得最厉害，连耳朵都震聋的一句话是：「没有人才」，也难

怪有此嚷嚷，多少年来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几乎没有一件事不窝窝囊囊，丢人砸锅。小民固然望人才如大旱之望海龙王，便是高高在上的二抓份子，私欲满足之余，也想到人才之妙，而兴「没有人才」之叹。好像中国气数已尽，人才到，此嘎然而止，绝了种啦；旧有的人才死光，再没有新的人才啦。尤其是二抓牌，坐在办公桌後翘起尊腿，自得其乐，偶尔抬头一瞧，四周站的全是给他们官做的子孙圈，想操其妈就操其妈，想罚其跪就罚其跪，自己一咳嗽就有人研究该咳嗽的哲学基础；自己一搔耳，就有人立刻以头碰地表示搔得好呀搔得好。而那些圈外之人，有的不准操他妈，有的连罚站都不接受，有的多嘴多舌，有的专唱反调，有的不听话，有的更为荒唐，竟然说我的咳嗽是害感冒，而搔耳不过因为痒。呜呼，在他阁下的尊眼之中除了奴才，就是乱民，同样也是没有人才。

问题就在於，中国真的气数已尽，人才也真的绝了种乎哉？恐怕多少有点量馀地，唐太宗李世民先生有一次教封德彝先生举荐贤良，好久没有消息，李世民先生催他，你猜他说啥？他也是绝种论，答曰：「非不尽心也，但於今未得奇才。」好像凡是奇才之士，额上都刻着字，他一拣就拣到了手，既然没有刻字的，便无法度，於是李世民先生曰：「但患己不能知，安可诬一世。」这一个钉子碰得响亮，千载以下，仍在耳际缭绕。还有後高祖姚兴先，也有一钉，他梁喜先生物色人才，也是过了很，久再催促，梁公也是绝种论，答曰：「未得其人，可谓世之乏才。」姚兴先生曰：「卿自识拔不明，岂得远四海乎？」李世民先生和姚兴先生，仅凭这个钉子，就应该名垂寰宇。有的人动不动就叹没有人才，应该马上送到地方法院，去吃诽谤官司。

君读过王安石先生论孟尝君之文乎？孟尝君田文先生是战国时代叁「君」之一，也是叁「君」之首，他阁下有一次出使国，昭王嬴稷先生打算逮捕杀之，以除後患。田文先生听啦，急得团团转，转到最後，人才出焉，一个圈里人善於窃盗，乃夜入秦宫，把田文先生送给嬴稷先生一件价值五十万美金的海勃龙大衣，偷了出来，转献给嬴稷先生的宠姬，该宠姬想那一件大衣想得要命，一见大喜，乃在嬴稷先生眼前，用了点功夫，这才放他回去。走到函谷关，值半夜，按当时的法律，鸡鸣才开关，田文先生二度团团转，恐怕嬴稷先生改变主意，派兵追赶，一旦追赶得上，便尊命休矣。到了此时人才又出，另一个圈里人善於鸡叫，就当场表演，叫了两下，别的公鸡在梦中被该叫声惊醒，糊里糊涂也跟着叫，结果你叫他也叫，关门大开，他才算逃脱虎口。田文先生逃虎口之後，用不着说，一定芳心大喜，拍屁股曰：「幸亏我天纵英明，人才丛生。」即令他阁下没有这麼说，恐怕也会这麼想，想到得意之处，难免一番沾沾自喜。

然而王安石先生□觉得颇不对劲，他有一篇「读孟尝君传」，字数不多，且抄在下面：

「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，士以故归之，而卒赖其力，以脱於虎豹之秦。嗟乎，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，岂足以言得士？不然擅齐之强，得一士焉，宜可以南面而制秦，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？鸡鸣狗盗之出其门，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」

王安石先生认为，以齐国面积之大，人口之多，只要有一个半个人才，便足可以强盛，足可以把秦整的七零八落，田文先生根本就不会被叫到秦国去，受要囚要杀之辱。正因为田文先生左右充满了鸡鸣狗盗之徒，真正人才，才落荒而逃。

王安石先生为田文先生上了一个尊号，曰：「鸡鸣狗盗之雄」，中国历史上这镜头很多，有些人看起来精明能干，小聪明如连珠炮，忽冬忽冬，俨然俨然，实际上不过一个「奴才总管」、「一圈之长」而已焉。夫二抓牌尊眼中，人才和不听话是不可分的，事实上人才有些时候也确实不听话，盖奴才头「操」奴才的妈，奴才马上就在门口挂匾志庆；一圈之长罚子孙圈跪，子孙圈马上就削半截。如果刘备先生操诸葛亮先生的妈，或苻坚先生罚王猛先生的跪，恐怕他们很难忠贞不误。不特此也，纵然二抓牌於心不忍，其奴才一看，咦！你怎敢不把亲娘献上去呀，显然还有保留，这种人不可靠不可靠，也无你立足之地。

前已言之矣，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，开创之初，无不人才济济。可是到了后来，圈圈出笼，就非关系不行，而「才难」了矣。「才难」似乎并不对题，教头目舒服的人才固多的是，只不过教国家兴隆强盛的「才」才「难」。初期的姜小白先生，大智大慧，想吃山珍海味，就找易牙，想当圣人，满足满足自尊和虚荣，就找开方，想玩玩女人，就找竖刁，想治治国，把齐国弄强，就找管仲。等到管仲先生一命归天，他把国事寄托到前叁个人才身上，就糟了大糕，其结局如何，世人尽知，活活饿死不算，连□首都生了蛆，还没人发现。我们向不以「死」来衡量人，对不得善终的忠臣义士和英雄豪杰，敬意没有稍衰，但把齐国弄成那种样子，姜小白先生之昏，千载以下，尤使人跺脚。

人才和奴才誓不并立，奴才永远成不了人才，而人才也永远成不了奴才。表面看起来，越是末世，人才越少，左也窝囊，右也纰漏。古人谈到一王朝的衰亡，往往叹曰：「气数已尽」，到了无可奈何之时，也只好这么一叹。不过柏杨先生以为，似乎并不见得，盖气数尽者，人才绝也。问题恐怕是，越到末世，不但人才并不越少，相反的，人才反而越多。君不见旧政权垮台，新政权成立，在新政权下，不都是人才如云乎哉？秦王朝末尾几年，只剩下赵高先生一人，可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张良先生，韩信先生、萧何先生，固是秦王朝属下的乱民也。隋王朝末尾几年，也只剩下虞世基先生一人，可是唐王朝开国功臣李靖先生、尉迟恭先生、魏徵先生，同样隋王朝属下的乱民也。

末世政治最大的特徵，是把人才一一逼成乱民。这并不是说处心积虑的要别人反，而是「天下为私」的结果，有些酱不住的人，不得不反。君一看水浒传便知，像林冲先生，高太尉手执钢刀，咆哮曰：「你反不反？不反，老子就杀！」头目高坐堂上，凶态可掬，当然不怕你反。张叁反焉，大刀一挥，喀嚓一声，杀掉其头。李四反焉，大刀一挥，喀嚓一声，杀掉其头。只见他举刀如飞，威风凛凛。可是「反」是他阁下努力制造出来的，所以即令活活累死，也杀不完。杀来杀去，终于遇到一个脖子硬的，不是喀嚓一声啦，而是当啷一声，大刀震落在地，一个新政权出现。战国时代毛遂先生的故事，可帮助我们了解末世何以「才难」，平原君赵胜先生那一套话，听起来能把人气断了筋，他曰：「大丈夫处世，像把锥子放到口袋里，尖端会立刻透出来。阁下在我这里叁年，默默无闻，也没有一个人说你好话，恐怕你没啥没啥。」毛遂先生曰：「假如我被放到口袋里，尖端早透出来啦，而是我根本没有被放到口袋里呀。」盖口袋已被圈圈扎住，谁都放不进去，举目所及，不是在垃圾箱里烂着，就是已上了梁山，读史至此，涕泪交集。

赏饭学

作者：柏扬

提起黄天霸先生，恐怕无人不知。柏杨先生家乡，小孩子们有一首儿歌，遇到有人紧追一个问题时，对方即唱之以作回答，曰：「啥啥啥，黄天霸，对你说，你害怕。」可见黄公的威力，及於顽童。他阁下正是打渔杀家萧恩先生所说的「奴下奴」人物，有一次，侍奉他的主子「施大人」施不全先生，路过落马湖，落马湖上强盗如林，左搞右搞，竟把施不全先生活捉去。黄天霸先生慌了手脚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忙忙如漏网之鱼，东查西访，后来找到了一个老头，该老头是知道施不全先生下落的，黄天霸先生大喜过望，拍他的肩膀曰：「你的前程，包在我身上。」老头立刻磕头如捣蒜。我想，该老头磕头似乎磕得太早，如果仔细想想，老头的前程好像不是包在黄天霸先生的身上，而是黄天霸先生的前程反而包在老头身上。该老头如果不说出施不全先生的所在，黄天霸先生不但前程没有啦，失落了主子，君知是该何罪乎？势必连尊命都没啦。然而他不但不感谢老头，反而教老头他感谢他，这种赏饭学，真是一个典型的嘴脸。中国社会上似乎处处都有黄天霸，天天都在「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。」

中国知识份子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种动物，五千年来，以纯书生取得政权的，只有王莽先生一人，具次顶多刘秀先生算上一个。其他头目，这个「高祖」焉，那个「太祖」焉，「祖」字辈的头目，无一不是耍流氓耍出来的。然而王莽先生□落得万世唾骂，盖他阁下夹在两个姓刘的王朝之间，而东汉又是以西汉为号召，靠西汉那块招牌吃饭的。知识份子则是靠东汉吃饭的，就只好努力向姓刘的忠贞矣。假如王莽先生的政权能维持八百年之久，也成了「啥祖」，情况恐怕会大大的不同。不要说八百年之久啦，就是他阁下之後的王朝不是姓刘的，而是姓张王李赵，或是姓柏的，新王朝成了正统，具骂至少也轻得多。哀哉，王公。

中国知识份子能有王莽先生那种成就的不多，大多数只有一条路摆在脚前，那就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追随一位头目，听凭摆布。所谓「君择臣，臣亦择君」，拚命向有前程的头目那个圈圈里跳，永远寄附在别人的尾巴上。主子阔啦抖啦，就大吃大喝；主子垮啦，大家树倒猢猻散；主子对这种情形自然也「眼睛是雪亮的」。读者先生千万不要被古书弄花了眼，以为主子对奴才会「坐以论道」，该古书都是知识份子写的，硬往脸上抹粉，教人起鸡皮疙瘩。宋太祖赵匡义先生把刘昌言先生撵走了之後，有一次早朝，心里痒得忍不住，问左右曰：「他哭了没？」原文是：「昌言涕泣否？」后来把吕蒙正先生免职，又是心里痒得忍不住，又问左右曰：「望复仕，目穿矣！」被钱若水先生听见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的地位再，高竟不值钱如此，当晚就卷了行李，告老还乡。

其实赵匡义先生还算道德学问齐了天的。明王朝亡国之君朱由检先生更糟，他阁下一时兴起，把大臣们弄到朝堂，一字排开，向他们行上一揖，以示民主——那时的术语是以示「尊师敬道」，可是过不了叁天，□把他们

一个个掀翻在地，打得哭天唤地，两腿都断。朱由检先生昏蛋乎？昏蛋当然昏蛋，但也是政治制度和时代风气使然，黄天霸哲学在作怪也。

柏杨先生亲自瞻仰过的，有两人焉，一位是李鸿章先生，此公历史上的功过，自有公论，我们不谈。我们谈的是他脑筋中的「赏饭学」。他认为凡是比他官小的，都是靠他吃饭的，既都是靠我吃饭的，不教你跳楼，又不打你□子，而只是骂骂，该没关系吧。他的口头禅是「操你妈」，终于有一天操到了自己的妈。记不得啥书上看见的啦，有一位知府老爷，闻「操」之後，肃然曰：「卑职不敢操大人的妈。」李鸿章先生最後一次当官，是八国联军之役，太监拿着诏书，叁更半夜敲他的门。清王朝之例，凡大臣「赐」死，都在半夜，别看李鸿章先生操人妈时，其势汹汹，一听敲门，他自己的妈有被赏他饭吃的人「操」之可能，就涕泪交流，召集家人，泣曰：「子子孙孙，切勿为官。」开门一看，原来升啦，他是否又劝他的子子孙孙可以照样为官，书上没有交待，真是遗憾。

第二位是冯焕章先生，此公伙夫出身，做到当朝一品，其官之巨之大，不用说矣。他大概是李鸿章先生的嫡传弟子，平生以黄天霸自居，把部下当成豕猪，想骂就骂，想训就训，西北军闲话轶事中，差不多都和「骂」「训」有关。後来当兵役部长，又当汀北省政府主席的鹿鍾麟先生，在电话上挨了一顿臭骂後，冯焕章先生千里外还馀怒未息曰：「混蛋，给我罚跪一小时。」他答曰：「报告总司令，已经跪下啦。」说跪下真跪下，就在电话机前跪了一小时，奴态可掬，使人起敬。

从前帝王时代，再大的官见了皇帝都得磕头如捣蒜。太平天国一闹，满清政府的前程明明是包在曾国藩先生上的，结果黄天霸出现，曾国藩的前程反而倒转过来包在满清政府身上。他阁下见了慈禧太后那拉兰儿女士，跪在地下，一跪就是几个小时，因为那拉女士特别看得起他，[酱话谓之「圣眷甚隆」]，要和他长谈故也。後来看他阁下跪得实在可怜，才特别开恩，准他——咦，读者先生切莫快嘴，以为准他坐下，他离坐下的距离还远哩。而是准他爬下，当然不是爬到泥地上，而是爬到锦墩上。再到了後来，该「文正公」实在太老，才第叁度开恩准他作日本人状，蹲到自己的小腿上。不特此也，满清王朝中再高的官，见了皇帝和那拉兰儿女士那个烂女人，都自称为「奴才」，这个称呼太绝，可列为人类十大奇观之一。不要说叫啦，便是听一听都过瘾。可是，所有的大臣中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奴才的。像曾国藩先生，身为满清王朝「再生父母」，可是他想当奴才还不够格，盖只有圈里人才有资格当奴才。若曾国藩先生，只能自称为「臣」。我们不妨在这里顺便研究研究他阁下，曾先生能成功一番事业，当然颇不简单。但我们注意的□是他阁下的做官之道，真是有空前的心得，出任官惠大学堂校长，包管胜任愉快。尤其对「固位」之术，更有一手，为了自己的官，视别人性命前途如粪土。一攻入南京，马上解散湘军，以便他的官稳如泰山。此公的眼光惜乎只——於历史酱缸，而不敢稍微挣扎，只知道从历史上从取得陈旧的教训，而没有智慧向西洋吸收新的知识，所以他的境界只好——於当官，他的学问也只好——於固位，不能进一步对国家民族有何裨益。

贵阁下不要以为「骂」是一种侮辱，有此一念，天地不容。从想当奴才都当不上的镜头，可知当奴才有奴才的妙用，这妙用和「听话学」有关。嗟夫，奴才最大的特徵是听话，主子大骂特骂，是在侮辱我，乎非也，实际上□是看得起我，盖「挨骂为升官之本」，一个人不管你作了啥丧尽天良，

亡国灭种之事，李鸿章先生焉，冯焕章先生焉，一见你就破口大骂，不但「操」你妈，还「操」你家所有的女人，尊心尽管放宽可也，准啥屁事都没有，盖你已经被认定是他的人啦。即令垮台，前不已言之乎，过两天又可当别的官焉。可是一旦二「章」先生见了你客气非凡，握手言欢，喊你「老哥」，呼你「贤弟」，然後含笑送客，好啦，你还想当官？当个屁吧，不祭出法律要你的尊命，已是你祖宗积德矣。

说不准学

作者：柏扬

是若干年前的事啦，有人对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，於是义和团徒弟徒孙气得□胸打跌，群起而攻之。彼时还不流行立法委员提质询，说谁动摇国本的学问，所以攻了一阵，也就偃旗息鼓。我想现代人物最大的特点是蠢血沸腾，从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和真正冷静的想一想，而只一口咬定：「把堂堂中华，去比殖民地。」好像只要这麽比一比，其思想就有问题。至於比的对不对，是不是那麽一回事，通不管他娘也。南北朝时祖挺先生对北齐帝国皇帝高演先生曰：「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。」高演先生跳高曰：「你敢把我比项羽？」几乎把他阁下活活打死。其实高演先生舔项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，但他有权在手，就有资格踢腾。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，一直传统到现在，自然日益发扬光大。

香港自由日报上有马五先生一篇短评，介绍了一则香港故事。一个叁作牌向街头无牌熟食档收了六元港币贿赂，结果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。马五先生赞曰：「香港是殖民地，一般人对殖民地的政风皆另眼看待，认为黑暗面大过光明面，区区六元港币规费，何足道哉？然而法院却执法不□，对公务员的贪污行为，决不饶恕。收受六元贿赂，本质上与六十万元贿赂，并无区别，非法贪污则一也，这便是法治精神。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，贵在人人奉如神明，它即发生灵验，拥有祸福人群的权威。假如执法者受着人情或某种外来势力的干扰，稍有瞻徇，而枉法或执法以从事，法律的尊严即荡然无存，谁也对它不发生信奉的观念矣。因此，我想到中华民国司法界在台湾的若干现象，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远甚。例如同样是公务员，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，贪污有据，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，有的竟宣告无罪，还要官复原位，顾盼自雄。法官可以声称「奉命不上诉」，诉讼处理必须「配合国策」，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乎？至於行政人员遇到收取红包，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，靡然成风，肆无忌惮。像香港警士取六块钱的规费这回事，如果是在台湾，他会招来徒刑之灾乎？」

柏杨先生所以引用马五先生原文，因马五先生的尊头比柏杨先生的硬，颇可以抵抗各种飞帽。不过如论起学问来，他阁下就差得远啦。他不是问该贪污六元贿赂的叁作牌，在台湾会吃官司乎？意思是说，如果他在台湾，决不会吃官司。其实不一定也，其中道理，柏杨先生发明有「说不准学」，可供参考。马五先生说他简直要发思古之幽情，他曰：「我非常赞许一百年以

前的腐败旧制度，行政和司法不分，集中於一个官吏之身，听他随意处理，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响，对一般人民，反而比现在这样口称法治，行属人治的後果好的多。」

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，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制时代都不如，真不知是何居心？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怒，以示忠贞不可。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，而是马五先生说的，帽子铺掌柜的如欲飞帽，千万别飞到我头上来，务请认清目标，迳向他阁下猛扣可也。不过偶尔有时候，一些不长进的朋友，也跟着会发出一阵同样思古之幽情的。不必用学院派的方式找根据啦，且说说京戏吧，君看过「四进士」乎？真是绝妙好戏。话说开店的老头宋士杰先生，不甘屈辱，顶撞了县太爷几句，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，县太爷岂能例外，就打了他四十大板。

官司打将下来，闹到最後，公堂之上，宋士杰先生翻出县太爷受贿的底牌。其中有几句对话，世人不妨洗耳一听。

县太爷曰：「宋士杰，你好厉害的状况。」

宋士杰先生曰：「大人，你好厉害的板子。」

县太爷悻悻然曰：「好好好，等我回到衙里，再和你算账。」

宋士杰先生笑曰：「怎麽，老哥，你还打算回去呀？」

县太爷一听，打了一个冷颤，真的当堂就被摘下纱帽。

呜呼！虽然那是一个公开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时代，但也是个说得准的时代。以一个开小店的老头，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，一定会得到某种惩罚，真是奇迹。今天便不然矣，不但开小店的老头说不准，连名震海内外的马五先生都说不准，还茫茫然问曰：「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？」当然是「说不准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」。即以该香港的叁作牌而论，贪了六元小污，香港政府就判他六个月，马五先生以为如果在台湾，准啥事都没有，恐怕不太见得，说不定经过法官自由心证了一番之後，说他动摇国本，判他六十年哩。

正因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，可有可无，兴之所至的，中国人便只好恍恍惚惚过日子，能二抓就二抓，能乱兼就乱兼。最妙的是，越是二抓得凶的人，越是教训别人不要二抓。越是声明他啥也不抓的人，越是抓的凶。我们社会就好像一幅毕加索先生的调颜料板，五光十色，好不可爱。洋大人见之，伸大拇指曰：「进步进步。」或点头赞叹曰：「提高提高。」结果苦了一些既无啥可抓，又无啥可兼的老弱残兵，用别人买一双皮鞋的钱，来养活全家。

养活全家不算，不时的还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，教他节约救国。

我们已一再反覆言之，中国传统文化中什麼都有，独缺灵性。我说什麼都有，那是真的什麼都有，不信的话，翻开古书瞧瞧，圣人也好，君王也好，篇篇言论，头头是道，而实际上又如何哉？君知道黄道周先生其人乎？明政权覆亡，异族入主中国，凭我们的想像，一定以为官民同心，一致对外了吧。如有抗敌英雄，也一定会被人顶礼膜拜。黄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军捉住押解到南京，堂堂皇皇，慷慨就义，你猜他遭遇了些啥？所经之地，有千里之遥，沿途所见，不但没有一点亡国现象，那时适逢新年，中国小民还一个个穿新衣，戴新帽，访亲戚，拜朋友，玩龙灯的玩龙灯，赶庙会的赶庙会，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。偶尔抬头，看见一队鞑子兵，押着一个白发老头，绳困索绑，头上戴枷，手上戴铐，脚上带镣，不仅大为惊奇，连猴戏都不看啦，一拥而上，看起老头来啦。经鞑子兵介绍，原来他名叫黄道周，犯了叛乱之

罪。大家一听，啊呀不好，叛乱罪是要杀头的，挨不得挨不得。只有若干顽童，拣起石子摔到黄先生头上，以示薄惩。比较懂事的老年人乃叹曰：「这麽大年纪，不知安份，竟去造反，真是个大傻瓜。」呜呼，不要看书本上、报纸上，或二抓牌讲演时猛烈推崇忠臣义士，推崇的无微不至，实际上真正的忠臣义士，无不寂寞可怜，被人「叹曰」也。

这是一种不讲是非，也不懂是非，而只一味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，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。凡是有异於这种气质的行为，都被嘲弄或被惋惜，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。不仅小民如此，应该最具有灵性的知识份子，也是如此。君看过「康圣人显形记」乎？十九世纪九零年代出版，说的是康有为先生戊戌政变和结局，其中叙述六君子临刑的那一段，是全书精华，读者先生，不可不看个仔细。书上曰——「那隶卒当先走到康广仁等六人面前说道：『恭喜，恭喜，诸位老爷们，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。』那六人一闻此言，知道就要伏法，不由得心内一惊，彼此相视，一言不发，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：『青蒲饮泣知无补，慷慨难酬国土恩，欲为公歌千里草，本初健者莫轻言；望门投止怜张俭，直谏陈书愧杜根。手掷欧刀仰天笑，留将功罪后人论。』林旭将诗吟罢，那禁卒令六人出了监门，直望刑部大堂而来。

但见堂上两旁，皆列着营兵，个个手执刀斧，好不森严可畏，当下健役将六名官犯，押到堂下，当由监斩官点名已毕，困绑手上前，将六人剥去衣服，当堂背绑停当，各在背後插了标记。监斩官喝令起身，堂下那些营兵差役，均各前後押护而行。出了刑部门，各官犯乘没□骡车，一队队刀斧手、长枪手、马队、步队、洋枪队，犯车两边，每乘车有八名刀斧手围护，刽子手在後跟随。末後，监斩官头戴大红斗笠，身披大红披风，押解在後。真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人人剽悍，队队整齐。出了宣武门，直望菜市口而去。沿途经过，那些看热闹的一层层拥挤不开。只见得刘光第坐在车中，两目双垂，一言不语，自己悔恨已迟。林旭仰面朝天，浩然而叹。杨深秀口叫皇天，自己幻梦未醒。谭嗣同、康广仁、杨锐，皆有懊悔之状。两旁观者，莫不互相议论，皆因康有为一人作乱，连累许多官家子孙，身首异处，他□逍遥法外。你言我语，议说纷纷，不一会，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，跪在一处，每名仍有八名刀斧手，拥护左右，四面皆系大旗队、洋枪队、马队、步队、围绕四周，直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。监斩官坐在公案上面，只待午时叁刻，即便行刑。一会只听得值时官报道：『已交午时叁刻，请即行刑。』监斩官闻报，当即勾绝了六人名字，忽听喝道：『行刑牌下。』那刽子手那敢怠慢，高举钢刀，只听一排炮声，这六名官犯的头，早已个个落下。可怜富贵功名，一旦化为乌有。」

看杀六君子热闹的人，和看杀黄道周先生热闹的人，有啥不同也欤？时间上虽然隔了叁百年，民族灵性□依然如故。该书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「悔恨已迟」、「有懊悔之状」，真是以猪猡之心，度龙虎之腹。最主要的是，该书作者虽没有叹他们曰：「真是大傻瓜」，□更明目张胆的讥笑那些为了实践一种理想，而牺牲了「富贵功名」的爱国斗士，认为不合算不合算。呜呼，伟大严肃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竟成了知识份子的嘲弄对象，这正是中国社会上特有的娼寮气质。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□去拼命鼓吹对权势的驯服，和对富贵功名的追求。六君子的死，在他眼中，最可惜的是：「富贵功名，化为乌有。」呜呼，中华民族复兴之机，看来使人紧张。於是有人就说，黄道周先生之事，乃明末之事，「康圣人显圣记」之书，乃清末之书。

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，现在是啥啥啥啥时代矣。啥啥啥啥者，吉祥蓬勃之词，我们不加论列，盖论列了恐有未便。我们只是想，自明末至清末，叁百年之久，都没有什麼起色，自清末至今天，又继续被酱了五十年，其僵其硬，恐怕还要更重。

一九五八年种玉麟先生和他的几位青年朋友，驾着「自由中国号」小舟，横渡太平洋，报上天天有赞扬他的新闻，社会上也天天有座谈会、茶话会、交谊会，等等之会，对他恭维备至。有一天，柏杨先生拜访一位作家，（尊名说不得，说了就挨揍），他是负责编「特刊」的，我问他感想如何，他摇头而露牙，冷笑曰：「一个小浪就沉到底啦，这种傻事，我不干，我不干。」

其实不但他不干，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干，盖灵性被酱之後，正人君子，就有两副嘴脸，一曰群众嘴脸，一曰子弟嘴脸。对群众时一副嘴脸，对亲人时又是一副嘴脸。或上得台盘，或写起文章，或致起训词，或坐在办公桌後，是一副嘴脸；该嘴脸也，凛凛然大义灭亲，不可侵犯。但一旦回到自己家里，想想自己，想想妻子儿女，便另是一番嘴脸也。种玉麟先生驾一只帆船，上面有若干现代化的设备，而且又逢太平洋最太平时期，危险是有的，但并不就等於往火坑里一跳。作家老爷已如上述，官崽的表情，就更为可观矣。我有一位当官的朋友，出席某学堂座谈会，慷慨陈词，唾沫横飞，差一点就当场自杀，以表他视死如归。可是回到家中，小儿子告诉他已写信给种先生，要求也参加一份，他就立刻跳起高来，骂曰：「船翻了怎麼辦？」并引用圣人之言曰：「务虚名而得实祸，务虚名而得实祸。」

从前的酱缸固是酱缸，□是大酱缸，还偶尔有点空隙。自从来到台湾，大酱缸变成小酱缸矣。人的想法、看法、见解，也跟着更浅、更短、更庸、更俗、更教人起鸡皮疙瘩。大家有口皆碑，说种玉麟先生了不起，那是希望别人去傻，自己并不打算去傻。大家都赞扬张叁，目的是希望别人当张叁，自己并不希望当张叁。大家都赞扬李四，也是希望别人当李四，以便自己舒舒服服过日子，如果让自己当李四，怕全家都哭上叁天。咦，对岳飞先生，谁不尊敬？问题是有几人愿意自己当岳飞？又有几个人愿意自己的儿子当岳飞？不过研究起来，也不能怪谁。中国立国五千年，好像很少有光荣结局的民族英雄。翻开历史书看看，凡是有干才，有眼光，有见解，忠心耿耿，为国尽忠，拯救国家民族的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，几乎全没有好下场，不是被杀，便是被辱。五千年来，凡当权的家伙，几乎是除了二抓牌，就是二抓牌。那就是说，中国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的奸胜忠败，劣胜优败的反淘汰历史。血迹斑斑，可以一个王朝接一个王朝查考，也可以一个人接一个人查考，包管能把你查得奄奄一息，油然「叹曰」。

中国人与酱缸

作者：柏扬

本文是柏杨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华府孔子大厦讲辞。
《北美日报》记者记录。

刚才主席讲。今天我能和各位见面，是「松社」的荣幸，实际上，却
是我的荣幸。非常感谢他们，使我离开祖国这麼远的地方，和各位见面，请
各位指教。本来主席和《新士杂志》社长陈宪中先生告诉找，这是一个座谈
会，所以我非常高兴愿意出席。直到昨天从波士顿回来，才发现这是一个演
讲会，使我惶恐。因为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，藏龙卧虎。我仅仅将个人感
受到的，以及我自己的意见，报告出来。这只是发表我自己的意见。而不
是一种结论。请各位指教，并且交换我们的看法。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「
中国人与酱缸」，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，我们就要先提出来，什麼是中
国人？什麼是酱缸？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，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。
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：人人都知道的事，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话，这
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，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讨论不
容易开始。

记得一个故事，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--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
的，说：「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，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
麼样的人？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。

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麼样的人？」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
句话：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後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」假定你这
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，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。假定你这辈子有
无穷的灾难，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。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
在座的先生小姐，如果是佛教徒的话，一定很容易接受，如果不是佛教徒的
话，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後世，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。

我的意思是，这故事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。在座各位，不管是哪一
个国籍的人。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，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。不

高兴是如此，高兴也是如此。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。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地区，而只指血统。

中国人近两百年来，一直有个盼望，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。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。但是，多少年以来，我们一直衰弱，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。但是，从文化上追寻的话，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，为什么我们到今天，国家还不强大？人民还受这么多灾难？从无权无势的小民，到有权有势的权贵，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，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，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。

我记得小时候，老师向我们说：「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。」但是我们现在呢？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：「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。」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，推到什么时候？海外的中国人，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，也盼望得更为殷勤。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，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，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，这正是所谓前生因，今世果。

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。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。我亲身的经验是“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，在她们那时候都是缠足的，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简直难以想像。为什么我们文化之中，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？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，把双脚裹成残废，甚至骨折，皮肉腐烂，不能行动。而在我们历史上，竟长达一千年之久。我们文化之中，竟有这种野蛮部份，而更允许它保留这么长的时间，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，有害健康！

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。而对男人的迫害呢？就是宦官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宋王朝以前，但凡有钱有权人家，都可自己阉割奴仆。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，也就是宋朝开始后，才被禁止。这种情形。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份。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，不合理性的成份，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。

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，都像长江大河，滔滔不绝的流下去。但因为时间久了，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，像死鱼、死猫、死耗子，开始沉淀，使这个水不能流动，变成一潭死水，愈沉愈多，愈久愈腐，就成了一个酱缸，一个污泥坑，发酸发臭。

说到酱缸：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。我是生长在北方的，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，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，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。酱是不畅通的，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。由于死水不畅，再加上蒸发，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。我们的文化：我们的所谓前生因，就是这样。

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「官场」。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，就在做官。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「场」，是由科举制度形成，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，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。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，唯一的追求标的，就是做官，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书可以做官，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。从前人说：行行出状元。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，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。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，有很多限制，不能穿某种衣服，不能乘某种车子。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。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，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，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，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，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，以官的利益为利益，因而变成一种一却标的指向「政治挂帅」。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、更加浓。

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，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、猜忌。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，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，比较快乐，经常有笑容。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，虽然很快乐，却很少笑，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？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？

由於民族的缺乏朝气，我们有没有想到，造成这样的性格，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？中国人的人际之间，互相倾轧，绝不合作。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，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，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？这种心理状态用於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。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有这种类似情况：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麼好处？形成彼此间的疑惧。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。

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，有资源，有人口，八亿或者十亿，能够同心协力的话，我们在亚洲的情况，那里会不及日本？

由於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丧，中国人在这个酱缸裹酱得太久，我们的思想和判断，以及视野，都受酱缸的污染，跳不出酱缸的范围，年代久远下来，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，缺乏道德的勇气，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，而再不能思考。一切行为价值，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。因此，没有是非曲直，没有对错黑白。
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对事物的认识，很少会进一步的了解分析。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，终於来了一次总的报应，那就是「鸦片战争」。

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，对中国人来说，固然是一次「国耻纪念」。但从另一角度看，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。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，跟我们似乎不同。十八世纪时，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：使日本打开门户，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。他们把一种耻辱当做，一种精神的激发，

事实上，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，如果没有鸦片战争，现在会是一种什麼情况？至少在座的各位，说不定头上还留着两根辫子，女人还缠着小脚，大家还穿着长袍马褂。陆上坐两人小轿。水上乘小舢板。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二百年前发生，也许中国改变更早一些，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，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认为这个「国耻纪念」，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，没有这一次冲击，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。最後可能将窒息而死。

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，这使我们想到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清王朝是个最好的时代，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明王朝的话，中国会承受不住，情形将大不一样。西方现代化的文明，对古老的中国来说，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。这个大的冲击，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，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，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。

所谓物质文明，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、大炮、汽车、地下铁等等。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，有那麼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，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。再说到精神文明，西方的政治思想、学术思想，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。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。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。

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。说「人命关天」，其实，人命关不关天，看发生在谁身上。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，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，当然关天。但如

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，人命又算得什麼？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。古圣人还有一句话，说：「民为贵。君为轻」，这不过是一种理想，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。以前的封建时代，一个王朝完了，换另一个王朝，制度并没有改变。把前朝推翻，建立了新朝，唯一表示他不同於旧王朝的，就是烧房子，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，自己再造新的，以示和前朝不同。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，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，自己行的是仁政，所以「仁政」要烧「暴政」的房子。如此一代一代下来。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。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。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，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。

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，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，是接近西方的，例如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」这样的话，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。事实上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，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，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、自由、法治这回事，虽然以前有人说，我们也有自由，可以骂皇帝，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，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，有那麼一点点自由。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，但得偷偷地背地裏骂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，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，但是民主、法治等等观念。却完全没有。

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，当然，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得不这样认为，否则就难以活下去了。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就是盎格鲁撒克逊。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，像他们的议会制度、选举制度，和司法独立、司法陪审制度等等，为人类社会，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，这是它对文明所做出的最大贡献，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。无论如何，再浪费的选举，总比杀人如山、血流成河要好。对於西方一些好的东西，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。有人说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，是在选举钱，而这种钱不是一般人所以可以负担得起的，即使这样，浪费金钱，也比浪费人头要好。

一切好的东西，都要靠我们自己争取，不会像上帝伊甸园一样，什麼都已经安排好了。

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，日子久了，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，一面是自大炫耀，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。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，忘记了影片的名字，一个贵妇人，她某一面是美丽、华贵、被人崇拜，另一面却是荒淫、无耻、下流，她不能把这双重人格统一起来，後來心理医生終於使她面对现实，她只好自杀。我们检讨自己病历的时候，是不是敢面对现实？用健康的心理，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毛病？

我们应该学会反省，中国人往往不习惯於理智反省，而习惯於情绪的反省。例如夫妻吵架，丈夫对太太说：你对我不好。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。说：「我怎麼对你不好，我对你不好，还做菜给你吃？」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，这样的反省，还不如不反省。

自从西方文化切入以後，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变化。在道德观念上也起了变化。

以前，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，现在你要打一下，试试看！年轻朋友很幸运的是。传统之中一些堕落的文化，已被淘汰了不少，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。在所有文化领域中。如艺术、诗歌，文学、戏剧、舞蹈，都起了变化和受到影响。

一谈起西洋文化、西洋文明，准有人扣帽子，说「崇洋媚外」。我认为

崇洋有什麼不可以？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，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。如果朋友之中，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，為什麼不可以崇拜他？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，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。由於我们的酱缸文化博大精深，遂使中国人「橘越淮则枳」。橘子在原来的地方种，生长出来，又大又甜，但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，却变成又小又酸了，这是水土不服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就是在我坐牢的十年中，一直营救我的孙观汉先生。他曾将山东省大白菜种子。

帶到璧斯堡来种，但种由来的菜，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。

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，学什麼，像什麼，而中国人学什麼，不像什麼。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。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，学得一模一样。中国人兄台找出藉口，用「不合国情」做挡箭牌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。甲午战前，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，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，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。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，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，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，也都推说「不合国情」。

像台北的交通问题，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，多少年来，却一直解决不了。我想如果对违规的人施以「重罚」，几次下来也就好了。但有人提出来应该要教导他们「礼让」，认为礼才适合我们国情。我们已经礼让得太久了。被坑得太深了，还要再礼让到什麼時候？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「斑马线」，「斑马线」本来是保护行人的，结果很多人葬身在「斑马线」上。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横冲直闯，到美国来後常常接到罚单，罚得他头昏眼花，不得不提高注意。就像交通规则。这麼简单的事，中国也有，可是立刻扭曲。一说起别国的长处，就有人号叫说「崇洋媚外」。事实上，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日本，他们有好的，我们就应该学。他们不好的，就不应该学，就是这麼简单明了！

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[日本能？為什麼我们不能？]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。由此可知，酱缸文化太深太浓，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，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。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，我问他为什么？他开玩笑说：「表示我不忘本呀！」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慧认清我们的缺点，产生思考的一代，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，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，变薄，甚至变成一坛清水，或一片汪洋。

中国人非常情绪化。主观理念很强，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做为判断标准。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、整体的概念。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，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。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，这是物理学上的。在人生历程上，最短距离往往是曲线的。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，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有鉴赏能力的社会，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。以前我曾看见过老戏剧家姜妙香的表演，他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脸上皱纹纵横，简直不堪入目。可是，这对他艺术的成就，没有影响。当他唱「小放牛」的时候，你完全忘了他苍老的形象。大家有鉴赏分辨的能力之後，邪恶才会敛迹。好像我柏杨的画和梵谷的画放在一起，没有人能够分别，反而说：「柏杨的画和梵谷的画一样！」那麽，真正的艺术家会受到很大的打击，社会上也就永远没有够水准的艺术作品。

中国虽然是个大国，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，心眼很小。前天我在甘乃迪机场搭飞机，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，醒来後飞机仍没有开，打听之下，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。我惊异的发现，旅客秩序很好，大家谈笑自如。

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。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。

旅客准跑去争吵：「怎麼还不起飞？怎麼样？难道吃不饱？闹什麼罢工？罢工你还卖票？」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：如果我是领航员。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。从这裏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，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，它不但包容这麼多肤色和种族，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，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。

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：像雷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，彼此之间各人发表政见：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。雷根并没说，你做了几年总统，只知道任用私人。卡特也没有说。你没有从政经验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？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。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质。

我对政治没有兴趣。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，但如果有兴趣参与，就应该参与，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。不管你是干什麼的，一条法律颁布下来，不但金钱没有保障，连自由、生命也没有保障。

但我们不必人人参与，只要有鉴赏的能力，也是一样。这种鉴赏，不但在政治、文学、艺术上，即便是绘画吧。鉴赏的水准也决定一切。那些不够格的，像我柏杨，就得藏拙，只敢偷偷地画，不敢拿出来。否则别人一眼看出来高下，会说：「你这是画什麼玩意儿？怎麼还敢教人看？」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，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，才不至於什麼事都可打个马虎眼儿，大家胡混，酱在那裏，清浊不分，高下不分，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。

我的这些意见，是我个人的感想，提出来和大家讨论，还请各位指教，并且非常感谢各位。

